

多角度透视国有企业问题的一套新作

——评《国企新策丛书》

张 弓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便一直是受到国人广泛关注的一个字眼,国有企业改革也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从扩权让利、承包租赁、拨改贷、利改税到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走过了近 20 年的风雨改革路,这些改革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因缺乏深层次的系统思考,仍然不尽人意。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不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企业界,抑或是政府官员都已开始认识到对国有企业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相机抉择方式,应该被更理性、更系统、更长远的方式所取代,即要有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构想。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卫东同志等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了《国企新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现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共分四册,分别是《多元混合:国企改革必由之路》《远离企业:矫正政府职能》《淡化官性:造就职业企业家》《遏制流失:构建国企监管新体制》。浏览全书后,我发现《丛书》作者已经跳出了就国有企业本身谈国有企业问题的简单思路,而是从微观运行、中观结构和宏观环境三个层次全面系统地对国有企业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整套《丛书》视野开阔、实例丰富、观点新颖、论述精彩,既注意了理论上的超前性,又注意了实际上的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了主编在序言中提出的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标新立异”的学术思想,这主要得益于该《丛书》拥有的集专业科研人员、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于一体的强大的写作阵容。纵观全书,有以下新意和特色:

1. 《丛书》根据亲身的实践经验和切身感受,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新问题。例如,作者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出发,总结了政府对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不合理干预,市场中介机构的异化,组建企业集团“拉郎配”等现象的共性,并以丰富的事例和详实的数据揭示了政府对企业过度干预的危害。提出了让政府“远离企业”,不要过多干预企业的问题。同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政府过度干预企业行为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理论研究入手,借鉴国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同模式,得出了重塑政府与企业关系,造就现代企业的结论。即首先必须调整过于分散的国有资本布局,重新构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为政府与企业分开奠定产权制度基础。其次必须在为国有企业创造充分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的同时,致力于建立以约束合理、激励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制度。最后,政府应建立以权责对应为核心的出资人制度。又如,

面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局面,作者提出了“谁对国有资产负责”的疑问。作者指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涉及到政府、企业和职工。但事实上大家都不负责。政府是负亏不负盈,根本原因是出资人不到位。法人代表是负盈不负亏,一是因为所有者缺乏有效机制来监督和约束所有者代表;二是因为法人代表负盈金额很小,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三是因为有一部分法人代表往往以流失国有资产以谋求个人利益。工人是盈亏都不负。国有资产存在于各个国有企业中,对各个企业的国有资产来说,最现实的关注者就是企业职工,他们作为“全民”的一部分应该高度关注他们身边的国有资产的利益,但是,工人对企业的亏损基本上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对盈利不承担责任,他们不是国有资产盈亏的责任主体。另外,《丛书》的作者还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诸如国有企业是不是真正上的企业?中国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曾试验过多种模式,而国有企业的困难似乎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整体亏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中国的国有企业有没有企业家?国有企业“官本位制”的症结何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障碍如何化解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2. 对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作者就长期以来理论界和企业界关于政府应否对国有中小企业整体亏困承担责任的争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我国国有中小企业之所以陷入困境,政府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一是政府应对国有中小企业的“先天不足”承担责任,国有中小企业的产生方式决定了其注定陷入困境的命运。二是政府应对国有中小企业的“后天失调”承担责任,国有中小企业之所以出现亏困,与政府在改革开放前后推行的有关政策不无关系,例如,国家对国有中小企业长期投入不足;国有中小企业负担相对较重;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中小企业地位呈下降趋势;政府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先后对以小型企业为主体的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等给予了优惠政策,而国有中小企业不仅没有上述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还承担了政府强制的社会负担。因此,政府应对国有中小企业的亏困承担有限责任。政府帮助国有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途径是:(1)以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调整为契机,构建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2)在过渡时期,各级政府应组建以亏困中小企业为主要对象的托管基金,由其发挥“企业病医院”的功能;(3)组建旨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4)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可考虑将乡镇企业局、集体企业办公室,以及与中

小企业有关的政府部门合并, 组建中国政府的中小企业管理序列。另外, 作者对国有企业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所涉及的几个政策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析。比如, “减员增效”, 作者认为就单个企业而言, 减员增效无疑是必要的。但对整个国有企业、整个社会而言, 减员过急, 冗员释放过快, 在当前会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 因此“减员”切不可操之过急, 必须把握好裁员进度, 同时还必须先做好安置冗员的准备, 解决办法是“增资转员”, 即增加投资用来开荒造地, 扩大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第三产业, 从而为数以亿计的人员提供就业机会, 使那些富余人员和被裁减下来的人员尽快得到安置,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除此而外, 作者还就国有企业模式, 经济法治化, 市场经济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企业本质特征, 关于国有企业内部党管干部的原则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3. 以科学严谨的求实态度, 冷静而又深入地进行研究, 为顺利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难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思路。作者认为,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广泛存在着因国有企业制度缺陷与经济转型要求不相适应所导致的三类冲突, 即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力事实上的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中所有者对其投资只承担有限责任要求的冲突, 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官僚制度与市场决定的效率原则的冲突, 国有资本流动的自我封闭机制与通过市场重组的运营惯例的冲突。作者对解决这些冲突的思路是: (1) 用存量国有资产赎买职工国有身份, 一种方案是成立地区性或行业性的企业转制基金, 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用于赎买职工国有身份的存量国有资产, 它们既可以是无形资产, 又可

以是无形资产, 既可以是实物资产, 又可以是货币资产, 但必须满足产权清楚、价值实在、能够流动的前提。另一种方案是用于赎买职工国有身份的存量国有资产转变为职工持股基金, 基金财产职工共有, 财产收益差别分配; (2) 构建多重约束机制规范企业行为, 首先是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约束必须到位, 其次是法规约束必须强化, 再次是伦理约束必须整合; (3) 重新认识公有经济, 构建多重公有产权制度。针对“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国有企业中缺乏操作性的难题, 作者以利益分配的实际过程为理论研究的着力点, 将整个利益分配过程划分为微观利益分配过程和宏观利益调节过程, 并进一步指出, 事实上公平与效率根本不是同一个经济过程的同等经济范畴, 效率是微观分配过程的原则, 其作用功能是以效率定分配, 排斥其他原则对分配的影响, 公平是宏观利益调节过程的原则, 其作用功能是以公平定收入, 它贯穿于利益调节的全过程。作者还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这一划分的合理性, 以及两个层次原则作用的实现机制, 从而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定分配制度提供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另外, 作者还就国有企业顺利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解决国有企业过重债务, 建立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向国有企业选派财务总监等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曾国安)

(上接第 120 页) 益将流入或流出企业”; (2) 对该项目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加以计量。“我们认为, 确认标准就象会计目标一样, 也有两个层次, 一是基本确认标准; 一是具体确认标准。基本确认标准是对具体确认标准的抽象, 而具体确认标准必须联系具体会计目标。

在单式簿记时代, 具体会计目标是核算收支及其结果, 因而确定的标准就是与收支相关的真实的会计对象; 在复式簿记时代, 具体会计目标是反映财产、损益、交易、债权、债务, 确定标准也就是与财产、损益、交易、债权、债务相关的、真实的会计对象; 在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后, 会计确认标准也就发展为与评价受托者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和企业管理相关的真实的会计对象; 在证券市场出现以后, 会计确定标准也就进一步扩大为与评价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投资者决策、企业管理等相关的真实的会计对象。由此可见, 基本确认标准是与具体会计目标相关的真实的会计对象; 而具体确认标准因具体会计目标不同而不同。由于具体会计目标随会计的发展而不断增多, 因而具体确认标准也不断扩大。

2. 会计计量属性。会计计量属性是指会计对象的可计量的某一方面特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在《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中认为, 现行实务中有五种不同计量属性, 即原始成本 (或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和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¹⁵。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B) 在《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认为, 会计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价值和现值¹⁶。可见, FASB 和 IASB 都是针对货币单位计量而提出的。我们认为, 无论用货币单位计量, 还是用非货币单位计量, 计量属性都包括“历史的量”、“现

时的量”和“未来的量”。在单式簿记时代和复式簿记时代, 由于具体会计目标所要求的都是历史信息, 因而计量属性即为“历史的量”。而在股份有限公司和证券市场出现以后, 具体会计目标所要求的不仅是历史信息, 而且还包括当时的和未来的信息, 因而计量属性也就成为“历史的量”、“现时的量”和“未来的量”三者的结合。

然而, 会计发展至今, 能够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会计对象在会计系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且历史信息具有可靠性和可验证性, 加之其是推测未来发展的基础, 我们认为, 未来的会计计量将是货币计量为主, 非货币计量为重要补充; 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 其他计量属性为辅的发展态势。

注释:

有关对“受托责任论”与“决策有用论”、“会计信息需求论”的详细分析与评价, 请参见吴联生:《上市公司会计报告研究》, 中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9 年 5 月。

12 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13 15 娄尔行译:《论财务会计概念》, 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2。

10 14 16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编:《国际会计准则》, 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2。

葛家澍:《会计学导论》, 上海,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1998。

11 郭道扬:《会计发展史纲》,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4。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会计学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余玉苗)